

永远的师长

□周梅森

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们的接触更多了。就在他退下的那一年，我的两部反腐小说又被改成电视剧，一部是《至高利益》，一部是《绝对权力》，两部戏的总顾问都是泰丰，是我执意要请的。有老书记在，就觉得有了主心骨。在那段一起采访，一起下生活，一起泡剧组的日子，我对老书记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知道他很小就当过兵，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身上中过枪、受过伤，在新中国的坦克工厂造过坦克。老书记慷慨激昂，像演员似的在宁波采访现场和我说话：共产党没有一己私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小说把这一点说清楚了，电视剧也要说清楚，说清楚了这一点，剧中的戏剧矛盾强烈一些也不要担心。

《至高利益》的剧情确实有些大胆：一个省会城市两任书记搞政绩工程，搞到经济崩溃，河流污染，下岗工人超过警戒线，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新书记李东方上任后，没再铺摊子，而是忍辱负重为前两任擦屁股，却引起了各种势力的围剿。这部剧播出后反应很好。河北某市组织市委常委们收看本剧，嗣后做出了一个决定：立即下马一个典型的政绩工程。

《至高利益》拍摄期间，《绝对权力》又在深圳开机了。其时泰丰书记的老友于幼军同志任深圳市长，剧组得到了深圳方面的大力支持。因为是总顾问，泰丰书记和夫人韩寒一起被我请到剧组，给导演、演员做政治辅导。泰丰同志和我们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在泰丰书记的把关下，《绝对权力》完成后，在湖南电视台首播大获成功，收视率达到了惊人的36%，创出了湖南电视台的一个收视纪录，这也是后来我说服《人民的名义》投资方把《人民的名义》卖给湖南卫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绝对权力》审查时，曾被某部门枪毙。出品方广电传媒老总彭益和尤小刚急得跳脚，让我带着，找到总顾问求救。于是，泰丰书记找到广电部和有关部门陈述意见，并向中央相关领导交了一封信，郑重声明：如果《绝对权力》播出后有

负面反应，由他负全部责任！最终，广电部长徐光春同志和一位副部长亲自审查了《绝对权力》的最后完成片，经部党组慎重研究后，光春部长又带着几个副部长和有关部门领导会商，放行了这部影视剧。

多年过后，每每忆及此事，我和那些当事人仍感慨不已，担当两个字好沉重，翟泰丰这样的领导不可多得。

爱之深，则责之严。泰丰书记也不是没批评过我，有时批评还很严厉。让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2016年创作小说和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时。老人家是总顾问，我照例向老人家请教。剧本搞到一半的时候，我让剧组打印了一份大字本送老人家看，准备过后开个创作研讨会。不料，老人看后情绪激动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过来，批评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轻描淡写处理反腐题材？现在我们的腐败到了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吗？多少高级干部腐败掉了，有些省市全面塌方，问题极其严重，你还像过去写《绝对权力》《国家公诉》那样怎么行？十八大后的党中央是在救党、救国，你不是一般作家，是反腐标志性作家，一定要拿出标志性的作品！泰丰同志的夫人韩寒后来和我说，打电话时，老书记情绪激动，握话筒的手直抖。后来，在作品研讨会上，他再次陈述了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我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才有了现在这个把反腐放到副国级的小说和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播出后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播出期间，许多剧作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重视，“丁义珍式”的服务窗口、司法腐败问题、公安部门插手拆迁等问题，都得到了一定程度地解决。群众反映说，这部作品比一些文件有效。因为看到总顾问是泰丰同志，许多老同志纷纷来电发微信写诗祝贺。陈石在常委会上为省委常委们讲历史的原由，其实一部分的原型就是泰丰同志。泰丰同志一次次和我说过他的军人生涯，讲战争年代共产党员的特权就是在战场上背炸药包，做敢死队，绝不是升官发财。战后伤亡惨重的敢死队撤下后向上级报账的细节和陈岩石的许多故事，都是泰丰同志提供的。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泰丰同志的音容笑貌，我的师长还是那么热情洋溢，那么开朗健谈，似乎人未走，茶尚温，余音绕梁。

亦师亦友忆泰丰

□叶文玲

10月14日，在《文艺报》头版愕然目睹翟泰丰先生逝世的新闻，震惊之余，我不禁泪盈满目，悲痛异常。

泰丰于我，真可说是亦师亦友。我与他相识已有20余年，说起来也不算短，多年的相处，自然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而今我虽沉疴已久，却仍要奋力提笔，只为记下这位热情坦率、豪爽直白的兄长，彼此之间那些殷切相待、促膝长谈的快乐时光，以及那份浓得化不开的相知相惜。

尽管内心悲痛，我记下的却都是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明白，泰丰若地下有知，一定也会要我这样写，这样记，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总是为别人的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喜悦。

就像他在去年给我发的微信中所说：“祝贺在今年浙江高考中，将你著名的散文《汴京的星河》选入现代文考题，为你高兴，共享你的荣誉。这是你的光荣，你的奉献，你的讴歌成就。当年，我们曾为你的每一个文学成就讴歌、高兴、欢欣……今天依然如故，再次为你祝福！问候我的老朋友‘山东诚实汉子’，问候全家！”

“山东诚实汉子”指的当然是我祖籍山东青岛的老伴。作为曾经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泰丰的心里几乎装着每一个作家，他确实确实是作家们能够拥有的好书记。正如《文艺报》在他的讣告里所说：“尊重文学创作规律，重视文学人才的培养”，是他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时最好的写照。

我与泰丰结缘，最早是在1994年10月，我视为自己“毕生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无梦谷》的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北京文采阁举办，在此期间有幸与泰丰见过数面。那时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位全无忌的长者，他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坦诚和直率，那种对周围同志发自内心的关切与热忱，让人觉得与他之间毫无距离，可以尽心交流。

1996年12月，召开了中国作协第五次作代会，这次的全国代表大会距上一次召开已有12年之久，这是尘封多年的一次会议，也是许多作家再度启航的大会，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会后不久，我的长篇小说《秋瑾》得以出版。泰丰作为知名评论家，仔细阅读之后，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整版评论文章《激昂壮美的史诗》，对《秋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除了对小说本身的评论以外，泰丰另有一份对文学和文学家的期许包含其中，他在文中写道：“本世纪文学的句号怎么画？能否画好？怎样继续开来，为新世纪的文学做出贡献？文学界的同志们都在思考，都在努力。这是严肃而又不能回避的历史课题，当今的作家们对此必须做出回答。”这是他对文学高屋建瓴的深层次思考，是他作为党的宣传思想干部的站位，是我辈所难以企及的，也是他忠诚于党和国家文化思想工作的生动体现。

“碧玉妆成一树高”——杨树柏，一个普通老农民的名字。

这样的名字有根、有形、有韵、有气、有魂，那泥土与生命的同频、和声与交响，发端于大地，馈赠于四季。生于1925年6月的杨树柏，像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双口三村的一棵参天大树，身披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枝叶和繁花，在战争与和平的涅槃中向昨天回眸，在历史和时代的接力中与今天相守，在乡村的变革与梦想中朝明天眺望。

1. 蝶变：从壮丁、解放军到志愿军

“汪汪汪……”几声惊恐的狗叫之后，双口镇的青壮年跑了个精光。

刚出正月，乍暖还寒。这是1948年3月风雨如晦的一个上午，国民党军队驻华北某部再次窜入双口镇抓壮丁。村公所大门口的柱子上绑着一个衣不蔽体的中年农民，他就是杨树柏的父亲杨君。国民党军放话：“你再不把儿子交出来，就再想回家。”在邻村躲避了整整3天的杨树柏只好乖乖走进了村公所。那一年，23岁的杨树柏不情愿地穿上国民党军服装。

1948年12月，杨树柏所属国民党军部队在张家口被解放军合围。这是杨树柏人生最重要的蝶变，也是一次华丽转身。“疾风劲草”入伍不到半天，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第三兵团第66师197师591团二营六连二排战士杨树柏，把复仇的子弹射向敌阵。为了表明决心，大字不识一个的杨树柏在火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有人跟杨树柏开玩笑：“张家口一战，你算是打了两场，上半场和下半场。”

“那下半场，才是我真正要打的。”杨树柏说，“我还参加了太原战役呢。”

1949年6月，197师奉命进驻天津以西地区。3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7师响应军委号召，就地帮助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咱是庄稼汉出身，过去给地主干活儿，如今给咱穷苦人干活儿，精神头儿当然不一样。”杨树柏说。

1950年10月24日晚，杨树柏和战友们从天津郊区的杨村登上火车——这是杨树柏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26日晚，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迅速跨过了鸭绿江大桥。这是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朝鲜战场。这也是杨树柏唯一的“出国”经历，他的身份是志愿军战士。

2. 传奇：一个人的掩护

“轰——轰——轰——”一颗颗、一束束手榴弹在空中划出一道道致命的弧线，从某高地呼啸而下，狂风暴雨般的弹片连同炸起的石头、雪块、树根一起在空中飞舞。这是位于朝鲜德高山某高地的一次战斗，敌人的进攻一次次被打退。

从早上打到下午，敌人开始纳闷了：阵地上到底有多少志愿军？其实就一个人，他就是杨树柏。

泰丰对于我的提携与帮助，远不止于此，一年后的1998年10月，他又为我的八卷本《叶文玲文集》在人民大会堂首发式的召开，组织部署、协调安排，最终得以玉成；能够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圣殿召开作品首发式，可算是一位作家至高无上的荣誉。而让这件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憧憬变成现实，其中的功劳，全在泰丰。嗣后他又将自己在首发式座谈会上的讲话加以整理，写下了热情洋溢的评论《寻觅美的芬芳》，对于我所信奉的“美是文学的生命”这一创作宗旨，作了系统性的剖析和评价，他说道，“作家的生存价值，就在于能够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审美的方式和辛勤的耕耘，来提高人类灵魂的质量”。朴实无华的话语，却句句在理，字字珠玑，至今听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知我者泰丰，知作者者泰丰！

既已相知，怎可不相见。我在浙江作协任职这些年，泰丰每次到来，我都必定全程陪同，谈文学，谈思想，汇报作协工作。他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任上，为浙江的文学发展，为浙江的作家，做了许多实事、好事，浙江省作协曾创办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便是在他的批示和指导下争取而来的。

他曾三次前往我的老家台州，最后一次前往，是2011年参加台州的“叶文玲文学馆”开馆仪式，仪式举办前邀请嘉宾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他，给他寄去了我手写的邀请函，他不但来了，还带来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礼物——巨幅油画《黄河壶口瀑布》。

无须多说，这幅画是文学馆收到的最好的礼物。画面气吞山河，壶口瀑布气势磅礴，显示出画家胸中的万千丘壑，其张扬奔放的艺术感染力，丝毫不逊于专业大师名家。

至今，这幅《黄河壶口瀑布》仍然静静地挂在台州图书馆“叶文玲文学馆”第三展厅的人口，来参观的人，一眼就能望见它，也绝对会记住这幅气势恢弘的油画。

开馆仪式上，泰丰很谦虚地要求最后发言，然而他一开口，就给我们所有在场的人带来了莫大的震撼与感动，而我，更是惊喜有加。

泰丰念了一首他特地写就的诗《讴歌人间美》：“一部大书/十六卷美文/每一个字都独照美的深情/每一个字都辉映晴的灵魂……”

至今我仍能记得，他那充满激情、雄浑澎湃的吟诵，在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回荡，一时间仿佛万物失声、风云变色，只留下他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回响在天地之间。

斯人已逝，而艺术与精神将长存。翟部长，泰丰兄，每念及你的名字，都仿佛能看见你开怀大笑的样子，看见你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势，人生一世，能够予以后人、旁人都是美好的回忆，如你这般，便不枉此生。

碧玉妆成一树高

——记志愿军老战士杨树柏 □秦岭

1951年2月11日，杨树柏所在的二排完成德高山某高地阻击任务后，他所在的班奉命掩护全排转移。疯狂的敌人向高地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中午过后，阵地上只剩杨树柏一人。为了迷惑敌人，杨树柏把阵地上的一挺机枪、几把冲锋枪和步枪分散布置在不同的掩体位置，从不同方向向敌人射击，给敌人造成高地上“人多势众”的假象。

敌人果然上了当，暂时停止了冲锋。杨树柏这才发现，可用的子弹已经越来越少。“轰——”敌机又开始轰炸。使用枪支已经无法打退敌人，杨树柏抓起几颗手榴弹，匆匆投向四面八方。为了搜集手榴弹，他连滚带爬，从战友的遗体上不断寻找。杨树柏发现，找到的所有手榴弹上，都有战友的血。

夜幕降临后，杨树柏这才捡起三支尚能使用的枪支，向战友的遗体行了一个军礼，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撤出阵地。

杨树柏与其说在奉命掩护全排转移，毋宁说在上演一场惊天动地鬼神的主幕剧。如果说真的是独幕剧，那么，杨树柏一个人的战斗，就是著名的横城反击战中最为悲壮的“片花”之一。这样的“片花”，如同后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给他颁发的“大功”奖状中“立功事项”中的那段说明：杨树柏同志在横城阻击战中德高山战斗时，自己一人曾掩护全排安全转移……

有人夸他：“您简直就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时过经年，记忆力严重减退的杨树柏早已忘记了影片的名字，但影片中王成用报话机发出的呼喊，他一张口就能复述出来。那句话是：向我开炮。

3. 倾情：历尽劫难救伤员

“快放下我！”

“不！”

“你来一枪，快打死我吧！”

“不！”

这是一位身负重伤的志愿军战士和杨树柏的对话。恳求中有绝望与无奈，回应中有执著与坚持。伤员是杨树柏在某高地完成掩护任务不久发现的。当时，杨树柏肩上挎着三支枪，手里端着一支卡宾枪。寒气一阵紧似一阵，雪封锁了他寻找连队的山路。眼看到半山腰的一片缓冲地带，他突然发现一块岩石侧面有个黑影。

战友？敌人？还是朝鲜兄弟？杨树柏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快速冲了过去。映入杨树柏眼帘的，是一位右腿被炸伤的志愿军战士，身子底下，是坑前那么厚的一片血冰。杨树柏二话没说，架起

伤员就走。在一个山洞里，杨树柏点起一堆篝火。杨树柏解下背包，把被面撕成布条，给伤员包扎了伤口。天刚亮，杨树柏使劲架起伤员艰难挪动。雪地上，留下了长长的三串脚印，两串是杨树柏的，一串是伤员的。

当时的杨树柏根本不知道，群山一隅，连队的战士们正在为牺牲的战友集体默哀，连部文书念到的牺牲人员名单中，就有杨树柏和那个伤员。

他俩刚蹭到一条被冰雪覆盖的大河冰面中间，敌机的轰鸣声就接踵而来。杨树柏迅速拽着伤员“扑通”跳进身边的冰窟窿里。敌机朝冰面扫射一阵，这才扬长而去。从冰窟窿里爬出来的时候，又湿又冷的棉衣棉裤正在迅速发硬。杨树柏很清醒，如果再不让身子活动起来，他俩就有可能冻成冰人。

临近中午时分，他俩靠近了一个被敌机炸得面目皆非的小村。朝鲜农民老朴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表示：“我愿意送你们找队伍。”老朴牵着牛，牛身上趴着伤员，杨树柏警惕地端枪断后。人和牛，在茫茫风雪中出峡谷，攀荒原，由近及远，慢慢变成了一个黑点，像地平线上的一个音符。

4. 亮剑：林海雪原中的“天津卫”

夜袭，行军，潜伏……迂回，包抄，冲锋……杨树柏先后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他对我说，“在朝鲜，我们连队几乎天天在行军或打仗，没有消停的时候。”杨树柏说一口天津话，当年战友们把杨树柏叫“天津卫”。

1951年2月，北满江一带天寒地冻，部队粮弹短缺，减员甚大。敌人有飞机大炮，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志愿军只能发挥夜战优势。在杨树柏记忆深处，印象最深的是“端窝”。就是趁敌不备，把敌人营房给一窝端了。

有一次，杨树柏所在部队接到拦截南朝鲜一支部队的任务后，星夜占领某高地，并分散潜伏在树林里。在夜战中吃尽了苦头的敌人担心重蹈覆辙，派飞机对周边山头进行了清理式轰炸，有些战士被敌人的燃烧弹击中，瞬间变成了火球……

敌人在山下安营扎寨后，没想到志愿军会像神兵一样从天而降，而且“降”到他们的枕头边。

“缴枪不杀！”杨树柏一边喊，一边挥起铁锹朝敌人的脑袋猛砍，猛砸，猛铲，猛剁。

那次“端窝”战斗，敌人连枪都来不及摸一下，就乖乖当了俘虏。“你这个‘天津卫’，搞搏斗还真有两下子。”班长夸杨树柏。杨树柏“嘿嘿”地憨笑几声，高高举起铁锹，说：“我一个庄稼汉，习惯了用铁锹。”班长说：“古代打仗，讲究亮剑，你这是亮锹。”“不，这也是亮剑。”

与美军争夺红桃山时，杨树柏奉命给前线的炮兵部队送炮弹。当时，志愿军的弹药后勤补给主要依赖人拉马驮，途中常常遭受敌机的扫射和轰炸，不少负重前行的战友倒在了运输线上。杨



杨树柏的军功章

树柏每次肩扛六发炮弹，一边躲避敌机扫射，一边猫腰突击，一趟，两趟，三趟……

突然，“砰”的一声脆响，杨树柏的左脸频频火辣辣地疼，奔涌而出的鲜血瞬间染红了炮弹。原来，从他身后飞来的一颗流弹，不偏不倚，削掉了炮弹外壳的一层皮儿，也蹭破了杨树柏脸颊的一层皮儿。

“嘛命不命的，咱这叫作战经验。”杨树柏卖完关子，才如实道来，“太侥幸了！”

大凡经验，往往是给真正有心人准备的。每当战斗间歇，同弄各种枪支是杨树柏最大的爱好。杨树柏叮嘱战友：“割麦要用镰，打仗要用枪；镰不磨不快，枪不校不准。多留神武器和弹药的配型，就能避免被动和不必要的牺牲。”“其实，枪归枪，打仗靠的是一股精气神。”

杨树柏话锋一转，这话，分明有一种扬眉剑出鞘的意味。

5. 军魂：仅剩一个肺叶的老寿星

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共有5个肺叶，可杨树柏后来只剩下一个肺叶。

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杨树柏并不知道，炮火和硝烟让他的肺出现了问题。横城反击战前，杨树柏所在连队奉命在某高地潜伏。他不怕潜伏，怕的是扛不住咳嗽暴露目标。

寒风凛冽，雪花飞扬，杨树柏静静地趴在雪地里，牙齿间死死咬着一根指头粗的树枝。咳嗽，成了他奢侈的美好梦想。

嘹亮的冲锋号骤然在夜空中响起。很多战士立即爬了起来，有些战士却已经被严寒夺去了生命。杨树柏也想爬起来，可被憋成缺氧状态的身子软成了面团。班长以为他冻死了，使劲揪了他一把。杨树柏起来了，又倒下了，可他还是起来了。来自祖国慰问团的文艺工作者这样夸他：“我看到了军魂。”

当年的双口镇，人人都知道杨君的儿子杨树柏上了朝鲜战场，村口的高音喇叭里每天都在广播志愿军战士频频告捷的好消息。有一天，广播宣传的英雄和烈士名单中，突然出现了杨树柏的名字。

1951年3月15日，66军凯旋回国。杨树柏出现在村口的时候，父老乡亲目瞪口呆。“你……真的回来了？”不久，杨树柏被提升为班长。

最终击倒杨树柏的，是严重的肺脓肿。就在他住院的日子里，一张邀请他赴京参加抗美援朝参战功臣庆功大会的通知书飞到了他的病床前。“这是我一生中遗憾的一件事儿。”杨树柏说，“说不定还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呢，可我……唉！”

改革开放初期，家里的情况慢慢好转，子女们终于说服杨树柏前往医院复查，胸透片子出来

后，医生们个个瞪目结舌。杨树柏的肺叶仅剩1个，其余4个已萎缩得不见踪影。这样的病例，在其他病人身上非常罕见。“走！回家。”杨树柏给子女们一声令下。

如今，95岁高龄的杨树柏除了耳朵有点背，身子扛得起，连拐杖也不要。乡亲们是这样总结的：“拿得起，放得下，让人家成了老寿星。”

一个肺叶的老寿星。杨树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

6. 红心：日子里最深厚的底色

杨树柏说：“我这人，一辈子也变不了。”二儿子杨立生自幼酷爱学习，从天津市武清卫生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成为杨家惟一的“公家人”。当时，杨立生谈了个对象，叫王金萍。王金萍远在天津大港某农场工作，还是一名业余作家。当杨立生跟父亲说女方的父亲也是一位志愿军老战士时，杨树柏眼睛一亮，说“行！行！行！我看这婚还行。”

王金萍的父亲叫王果然，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家里也藏着一大摞军功章。1987年，杨立生、王金萍喜结连理，两位志愿军老战士亲家终于见面了，三句话离不开朝鲜战场：平壤、汉城、横城、德高山……

2006年，有关部门给杨树柏落实了政策，每月享受200元的补助。当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次把补助递到杨树柏手上时，杨树柏说：“如今农村的生活好多了，我身子骨也强了，不愁吃，不愁穿，我要这么多钱干吗？”

如今的双口镇三村已经发展为誉满津门的明星村，村党委书记林旭生告诉我，今年“八一”前夕，村委会给杨树柏送去了2000元的慰问金，结果杨树柏拒绝接受，经村委会班子成员反复做思想工作，老人家才收下了。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杨树柏喜欢看电视里的军事节目，一看到部队大阅兵的场面，他的目光里就像有定海神针。有一天，他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华夏大地疯狂肆虐，马上问杨立生：“这也是另一种战场啊！我把这年纪，能帮点嘛呢？”

“您少出门，不添乱，就算帮忙了。”

“那，我捐500元钱吧。”

“无巧不成书”。2020年初，杨树柏的“家风”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天津滨海新区一位女士的注意，女士发现杨树柏所在部队的番号和自己父亲当年所在部队的番号一模一样，于是兴奋地给远在内蒙古的父亲贺喜贵打了电话。老父亲欣喜若狂，专门委托女儿拜访了杨树柏。女儿和丈夫拜访杨树柏的那天，特意打开了手机视频，于是，两位白发苍苍的老战友开始了长达半小时的“面对面”聊天。

“老杨，我是六连的司号员贺喜贵啊。”

“我是六连的杨树柏。”

也就是连，杨树柏他们向敌人发起的每一次进攻，都是贺喜贵吹响的冲锋号。“我第一次见到杨树柏，正是他掩护部队转移后归队的那天。”贺喜贵对我说，“我下次到天津，一定要和杨树柏见面。我们的心，都是红的。”

我相信，天各一方的杨树柏和贺喜贵一定能够实现阔别70年后的重逢。